

吳密察著

日本觀 察一個 台灣 的視野

作為一個台灣人，吳密察的觀察是多方面的，不僅觀察日本，也透過日本觀察韓國和澳洲。這些觀察綜合而言都是他的反省之資，更是台灣與日本展開辯證的中間項。文章表面看來似與台灣無關，仔細觀之則幾乎篇篇與台灣環環相扣。

——李永熾教授序——

D131.3
20116

港台書

——吳密察

日本觀察

——一個台灣的視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觀察：一個台灣的視野/吳密察著.--初

版.--臺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5

面：21 公分

ISBN：978-986-7862-98-3（平裝）

1.日本－論文,講詞等

731.07

95015989

日本觀察：一個台灣的視野

著 者：吳密察

出 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美原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23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ISBN-10：986-7862-98-8

ISBN-13：978-986-7862-98-3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個台灣人的日本經驗

——李永熾教授序

大體而言，經驗可分感性與知性。感性的經驗以主觀的感情認知為主，將所見所聞直接形諸筆端，一般遊記大都屬於這種類型。知性的經驗雖然也有感情介入，但主觀的感情和客觀的對象物常保持一段距離或空隙，以進行辯證作用。在這過程中，主觀的感情便成為認知的基礎，而顯現於外的則是冷靜的論述。

吳密察是以台灣史研究為終生志業的年輕學者，曾留日四、五年；這本書絕大部分是他留日期間的記錄。從這記錄的選材可以看出他的感情基底，例如他對日本保守政權的觀察、對家永教科書訴訟的關心、對琉球問題的重視等，在在都隱含著作為台灣人的一顆心。但在論述過程中，他並不把自己的感情顯露出來，反而把論述客體推延到明治維新以來的歷史過程。這是將自己的主觀感情投入歷史的認知中，進行有距離空間的辯證作用，再展現為文章。因此，他論述的雖是八〇年代的日本情境，但內在卻含蘊作為一個台灣人對台灣過去與現在的反省。在〈戰爭的理由〉中，他陳述日本保守份子以否定東京大審和昭和憲法，提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意圖將過去戰爭合理化的現象，最後引用丸山眞男教授「追隨現實」與「創造現實」的觀點批評日本保守份子追隨現實反為現實淹沒所導致的「無責任感」。若把這些陳述比照近年來台灣保守份子追隨現實的騎牆現象，豈無言外之意？而台灣的民主人士是否具有「創造現實」的責任意識，不是也值得我們好好省視嗎？

〈中曾根的新保守主義路線〉、〈保守復古的《新編日本史》〉、〈八〇年代日本的保守化〉諸篇，都在論述八〇年代日本保守的政治現象。日本八〇年代的保守化現象，一言以蔽之，是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交錯混雜的現象，美其名是清算戰後的屈辱感，以恢復日本人的自尊，然其運作幾乎是由

上而下「國民不在」的宣揚方式，既不是上下交織、互動的國民主義，也不是以住民運動為基礎由下而上的新「共同體」主義。但日本終究是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是高度資訊化的國家，國家主義已不易獲得日本人的支持，他們所關心的勿寧是「家庭」「休閒」。因此，日本新保守主義另一層面的「小政府」政策不僅可以贏得大企業歡迎，也能博取「己家主義」者小市民的幻想。可是，日本福利措施遠不如歐美，又是經濟大國，採取「小政府」政策對一般人民是否有利？當然是問題。如果看了這些篇章，再與台灣的現實比對以觀，民主已臻成熟的日本和民主原地踏步走的台灣，同樣是保守主義，兩者差距有多大！同樣是強調民族主義，但一在恢復民族自尊，一強調大中國主義，以出賣台灣為標的，而非恢復台灣人的自尊！當然，台灣與日本最不同的地方是，台灣在國際上依然處於沒主權的屈辱局面，而日本人對主權則如呼吸空氣一般自然；日本人在戰後至少已獲得完足的民主，卻仍為戰後被盟軍佔領而深感屈辱，台灣人迄今依然在為民主奮鬥不懈，為國家主權獨立全力以赴。從日本看台灣，台灣的保守主義簡直是沒有心靈與自尊的投降主義。

吳密察不僅觀察了八〇年代的日本政治，也同樣注意到日本社會。他對日本社會的觀照點主要放在教育和公害上，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可看出他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心思。在教育方面，他利用家永教科書訴訟過程，提出國民教育權與國家教育權在權利上的差異。在台灣國家教育權無遠弗屆的現況下，國民教育權的提出對台灣實具針砭作用。除此而外，吳密察藉《岩波文庫》發行六十周年表達了日本出版界在知識傳播上所扮演的社會功能。在公害方面，他以熊本水俣事件為例，描述水銀公害的過程，而其最引人注目者乃在於公害訴訟，進而指出公害不只是工廠的不法行為，更是「全社會的不

法行爲」。在台灣仍把公害視爲工廠不法行爲的狀況下，把公害視爲全社會應當負擔的責任，實具有莫大的意義。吳密察更在〈琉球的課題〉一文中陳述琉球石垣島居民爲反噪音、反環境污染寧願放棄建大型機場以謀地方繁榮的開發理念。開發與生活品質間的矛盾確是現代台灣所面臨的局面，也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作爲一個台灣人，吳密察的觀察是多方面的，不僅觀察日本，也透過日本觀察韓國和澳洲。這些觀察綜合而言都是他的反省之資，更是台灣與日本展開辯證的中間項。事實上，一個成熟的研究者，不管是研究本國史或外國史，都會在研究過程中展現出辯證過程，所以一切研究都有其現實性，也只有具現實性，研究才會有生命力，否則只是玩弄文字而已。吳密察身在日本，卻內蘊深厚的台灣現實感，所以寫出的文章表面看來似與台灣無關，仔細觀之則幾乎篇篇與台灣環環相扣。這種關係無以名之，姑且稱爲吳密察作爲一個台灣人的日本經驗，不知吳兄意以爲然否？

對日本的諍言

——代自序(一)

台灣，在地理上是日本的鄰居，在歷史上與日本有緊密的關係，目前是日本商品、資本活躍的市場，每年有大量的日本觀光客往來於台日兩地。但數十年來，台灣卻總是遭到日本的漠視、疏遠、誤解甚至曲解，台灣成爲日本遙遠的鄰國——不，日本根本不承認台灣是國家！

×

×

×

近年，日本似乎逐漸意識到台灣的存在，日本的大衆媒體終於斷斷續續地出現關於台灣的報導。造成這種改變的原因很多，但不能否認地，中國的變化是造成改變的決定性因素。七〇年代末期，中國改採開放政策，發動對台灣的柔性攻勢，台灣才不再是日本媒體的禁忌。八四年中英之間關於歸還香港的協定，使日本直覺地認爲台灣將以中國所主張的「一國兩制」方式，成爲第二個香港——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日本的電視新聞報導中英協定的消息時，電視畫面上打出的赫然是「次は台灣だ（接下來便是台灣了）！」幾個大字。當然，八〇年代後期台灣所顯示的經濟發展實力，和類似九〇年代前夕所發生的「東歐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破綻和失態，也使日本終於有可能將眼光轉離北京。

不過，我們可以確的是，日本終於將其眼光稍稍地注意到一向被刻意漠視的台灣，與其說是由於台灣內部的改變，勿寧說是由於台灣外部，即中國的因素。也就是說，是因爲冷戰體制的逐漸崩解、「國共內戰」狀態的「溶解」，才使台灣終於在日本的視野中浮現了出來。

雖然台灣逐漸浮現在日本人的視界範圍之內，但是如果我們檢視日本觀察台灣的角度，我們便會發現，日本仍然是在「國共內戰」或「國共合作」的框架中瞭解台灣問題，而且多少預期國共之間將

以或緩或急的某種形式，逐漸接近，甚至達成統一。我們可以說，抽離了「國共關係」，日本的台灣觀察便所剩無幾了。

日本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任何風吹草動，顯得特別敏感，並且總是過度解釋。例如，台灣政府開放人民可以赴中國探親之初，便有不少日本媒體大為喝采，預期這是台、中接近的一大跨步。但如今看來，這顯然是過於樂觀的想法。從結果來看，台灣人民赴中國探親、觀光，使台灣人終於可用自己的眼睛到中國大陸去確認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隔差，不但未如預期地為兩岸的統一製造出有利條件，反而為已逐漸僵化的台灣政府的反共宣傳，提供了有力的佐證。這似乎是當初日本媒體所始料未及，也是不樂見的吧！

日本的台灣觀察不但存在著意識型態的偏頗，而且多少受到中國觀點的左右。我們做為被觀察的主人，總是對日本的台灣觀察感到 something wrong（違和感）。

X

X

X

相對於 journalism 感情過剩的台灣觀察，日本政府的思考則一貫是冷澈的現實主義，重視國益而且強調形式性的規範。

日本的世界思考的單位總是「國家」——雖然晚近「脫國家化」的議論，非常喧騰，但日本的世界思考仍然沒有「脫國家化」，則是事實——因此，foreign 即是外國，一切與 foreign 的關係都被認為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問題。在這種思考之下，既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又無「國交」的台灣，便要從日本的世界地圖消失了——即使她就在隔壁。

沒有「國交」，成爲日本用來堵塞目前台灣與日本之間不正常關係的最重要藉口。在我的工作範圍內總經常碰到以下的麻煩：我任職的大學是國立大學，當我們想要邀請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者前來講學或參加學會時，我們經常會看到日本學者面目有難色。因爲日本把這種行爲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日本的邏輯是，既然沒有「國交」，那麼國家公務員（國立大學教員）便不能接受台灣的國家機構（國立大學）的邀請。甚至，我有一位在神奈川縣某縣立機關任職的友人，想來台灣從事研究調查，也被他的上司以台日之間沒有「國交」而勸阻了。

對照日本這種「國交主義」，我想舉一個美國的例子。去年底，我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出席學會，讓我驚異的是，在芝加哥的國際機場和俄亥俄州首府Columbus的機場，都看到公然懸掛有中華民國的國旗。我想這是值得日本思量的。

日本國際思考的現實主義，一向被稱爲「事大主義」，但我在此要強調的是這種現實的事大主義追從既有體制的性格。

最近日本輿論界討論中東派兵問題時，「聯合國中心主義」經常被提及。「聯合國中心主義」當然表示日本追隨聯合國意志的消極態度。但我要強調的是：「聯合國中心主義」反映的是，日本吝於付出做明確自我判斷的風險成本，放棄自己的判斷躲在聯合國的決定下的不負責任現實主義。對日本來說，聯合國的存在不是在體現國際正義——當然，現在大概已沒有人會天真地相信聯合國真是在體現正義——最重要的是，聯合國是「體制」，追從體制不但於理有據，而且風險最少。當年日本國內輿論雖然急著與中國建交，但日本政府仍然要等到中國進入聯合國之後，才與中國建交，顯然也是這

種追隨體制的論理。

「體制主義」的論理，當然也應用在其他的分野。例如，對日本來說，目前的中國便是體制，台灣是非體制；因此，當然倒向中國——雖然自民政黨權是傾向資本主義陣營的——。同樣的道理，在中共與民運兩者之間，日本也總是倒向體制（政權、執政黨）。至於對台灣，那就更只有國民黨，而別無他物了。

從形式的論理來說，日本這種做法似無問題，但如果檢討實質的內容，卻顯然大有問題。近代國家假設：政權體現國民的總體意思。因此，政權代表國民與外國進行交涉或交流。但是，誰都知道這是理想而不是現實，尤其在開發中國家，政權便經常只是壓制人民的暴力存在。那麼，只以政權（既成體制）為對手的國際交流，不但基礎薄弱缺乏安全性，而且甚至是不道德的。

當開發中國家的威權體制逐漸鬆解，民主化的幅度逐漸加大之後，以往以既成體制為對象的上層勾結外交，將不再靠得住，甚至將會引起國民的反感。唯有進行更廣泛的國民規模的相互說服和理解，才可能獲致真正穩固的友誼，這是我們對日本誠摯的忠告。

×

×

×

日本正被要求正面地面對世界，這表示日本不能再像以往一樣規避問題、逃避付出代價，而是必須以自己的判斷對世界做出積極的貢獻。在這個時候，近鄰的台灣對日本有什麼樣的期待呢？

當然，我們熱切地希望上述的種種偏頗情況不再發生。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何去何從，的確是東亞各國矚目的問題。但是，我們要提醒日本：唯有站在台北街頭而不是北京街頭，才能夠看清楚台

灣的問題。台灣的人命也沒有比中國人命更便宜。在各種艱苦條件的限制下，我們的努力還是不夠，成果也相當有限，但是我們沒有倖致。請不要誤解甚至曲解我們的努力！

這尤其是對日本的 journalism 的衷心期待。長久以來，日本的報社及通信社懾於中國的制裁，一直未積極在台灣派駐特派員，也是造成日本國民獲悉之台灣資訊片面、偏頗的重要原因，希望這種情況會有所改善。

另外，我們要求日本修正以「國家」、既成體制、形式上的規範這種框架來認識世界的辦法，而從更基礎的「人」的立場，來思考台灣問題。

一般日本人大概都有一個印象，那就是台灣人對日本抱著某種程度的好意。但是我卻要奉勸日本友人不能簡單地滿足，甚至被這種好感所惑，因為造成這種好意的原因，是不道德的殖民地統治。在台灣人表層的好意的深層沈澱著「怨懟」。唯有這樣去瞭解台灣人的好意，才不會誤會了台灣人的心情。

這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例。台北龍山寺，每天晚上都會聚集一群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們在此談天，甚至唱日本軍歌、講日本話，碰到日本觀光客時也會興奮地與之攀談。絕大部分的日本觀光客，可能會因為在異鄉旅途聽到這些老人的日本話而感到親切。但如果只是在這樣的層次上瞭解這些人或這種事像，那就太危險了。

這些人是被遺棄在台灣「日本人」。一九四五年，由於敗戰，日本結束了在台灣殖民地統治，以前在殖民地趾高氣昂的日本人，雖然成了垂頭喪氣的戰敗者，但先後回到日本去重新做新生的日

本人。唯有在殖民地被教育成「日本人」的台灣人，雖然也曾以「天皇赤子」的身分被動員投入戰爭行列，戰後卻被「遺棄」在台灣，成為沒有回到日本的日本人。他們是戰勝國（中華民國）裡的戰敗者（日本人）。他們不但在中華民國的「抗戰」正統中成為「民族罪人」，遭到包括自己子女的國民的白眼，而且因為語言的轉換（日本語→北京語），成為無法繼續接收知識和充分表達意思的時代孤兒。他們是在歷史的轉換中被遺棄了。如今，他們唱日本軍歌、說日本話，碰到日本人興奮地攀談，到底我們從其中是看到了他們對日本的好意還是怨懟呢？

台灣殖民地統治，對日本人來說似乎已遙遠得不復記憶了吧！我在東京留學時期，校園裡經常可以看到糾彈日本侵略中國、殖民統治朝鮮的標語，但卻從未看到提及日本之殖民統治台灣。日本政府對於侵略中國、殖民統治朝鮮的過往，都曾正式公開地表示遺憾、道歉之意，唯獨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迄未發一言，我們要求日本在正要踏步迎向世界時，嚴肅地清算過去的歷史。

×

×

×

去年五月，李登輝總統在記者會中公開、正面而嚴厲地批評日本一再漠視台灣。但日本的媒體對此竟然隻字未提，這已引起台灣國民的普遍不滿。日本媒體完全未理會李登輝總統的警訊的原因，除了可能是如上文所述的諸項原因之外，或許也認為日本之對台灣政策根本不存在問題吧！認為沒有問題，其實才是真正危險的。台灣在對日問題上，一向頗為自制，但長久以來的怨懟和一再遭遇不公平處遇的屈辱感，一旦鬱積到達極限而噴出時，卻會是具有強烈殺傷力的，希望日本有化解這種積怨

的智慧和誠意。

(日文原刊：岩波書店發行《世界》臨時增刊號，一九九一年四月)

對構築「東亞史」的期待

——代自序(二)

一九八二年以來，「教科書問題」一再成為東亞近鄰指責日本的材料，每次問題發生時，雖然總免不了被熱烈地討論一番；不少憂心東亞國際親善的人士，也在從事各種解決問題的努力。但吾人卻看不出這個問題，在最近的將來有解決的端倪。這是因為目前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方式，不但是偏差的，而且彼此之間幾乎無法對話；即使有人試圖以國際間的對話來解決問題，其實也因為東亞諸地域和日本，是站在完全不同的認識體系和實踐志向的基礎上理解近代歷史，所以討論也將只是各說各話，終將無法解決問題。因此，對於教科書問題的討論，必須有新的思考架構，否則只會是沒有生產性地反覆相同的劇本。

×

×

×

相對於東亞近鄰之站在被害者立場，以「結果論」的論理來斷罪日本的侵略行為；日本經常以歷史主義式的論法來辯解其即使是加害者的處境。將歷史事實置於歷史情境中來思考，當然具有避免「事後裁判」的偏頗的意義，但無限制地將歷史還原成環境（情境）的產物，卻顯然將失落了做為主體的行為者的判斷和意志。而且，縱使過程中有許多不得不爾的現實（環境），但仍不能就此否定結果確是發動了侵略行為。

與上述「結果論」↕「過程論」的構造類似的是「被害者」↕「加害者」的對立思考。實際的被害，使東亞近鄰可以輕易地盤踞「被害者」的立場，糾彈日本的侵略歷史。面對這樣的指控，雖有極右派的極端份子針鋒相對，但顯然大多數的日本人是會感到歉疚的。因此，吾人看到絲毫沒有對話和深層反省的悔罪方式，只要面對近鄰的指責，便「申しわけない」。「申しわけない」這個辭，相